

國民政府參與蘇聯「中國藝術展覽會」的曲折（1939-194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articipated in 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1939-1942

許峰源 Hsu, Feng-Yuan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Researcher, Service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摘要

我國在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為穩固中蘇友好關係，爭取蘇聯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曾經在西元（以下同）1939年將故宮博物院與相關機構重要典藏送往莫斯科，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公開對外展示。這些中華文物在蘇聯展覽，引起廣大迴響。本文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典藏的國家檔案，輔以其他報刊資料，剖析國民政府參與中國藝術展覽會緣由，其間除了展現璀璨的中華文化外，亦透過展品呈現中國抗戰實況，喚起國際同情。待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結束後，這批瑰寶在蘇聯盛情邀請下，移往列寧格勒繼續展示。未久，德蘇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力爭蘇聯儘快啟運文物回國，最終排除萬難完成是項工作，見證保管中華文物的努力。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order to obtain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stabiliz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each other, sent important cultural relic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 Moscow to attend the "Exhibition of China Art" in 1939. These important cultural relics were displayed to the public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aused a great response. This article uses archives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together with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addition to showing the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 there was also an attempt to show China's war situation to obtain international sympathy. After the Exhibition ended in Moscow, these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were moved to Leningrad to continue to display. Shortly after,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German-Soviet w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ried to ship back these cultural relic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finally succeeded against all odds.

關鍵字：國民政府、故宮博物院、中國藝術展覽會

Keyword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壹、前言

2014年6月24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共同舉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至9月15日展覽結束為止，總共吸引40萬多次參觀。緊接著，10月7日至11月30日，故宮博物院將出示的展品，移往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神品至寶展」，又吸引25萬餘人次蒞臨觀賞。整體而言，故宮博物院文物赴日本展示，前後吸引65萬日本民眾爭相目睹中國歷代繪畫、書法、織繡、陶瓷、青銅器、玉器、漆器、文玩、圖書、文獻精品等（註1）。這是臺北故宮博物院首次將重要文物送往日本展覽，增進日本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知，拓展臺灣與日本文化交流，亦為臺灣與日本文化外交的典範。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在北京成立，標誌清朝統治終結，中國數千年帝制走入歷史。自此之後，故宮博物院典藏中國歷代文物與皇室珍貴收藏，成為全球關切焦點，國內外人士無不希望親臨紫禁城，一睹中華文化風采。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諸省相繼淪陷，華北地區岌岌可危，故宮博物院鑒於時局艱困，遂排除萬難將文物遷往南方，避免戰爭的破壞。由於文物數量龐大，歷經故宮博物院精心擘劃，並獲得諸多機關協助，得以順利將5批文物先後運抵上海。這些文物典藏在上海，實非長遠之計，故宮博物院即規劃在南京興建館舍，作為典藏處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物暫留上海之際，故宮博物院曾接受英國邀請，選擇部分送往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¹。國民政府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首次在國外展示故宮博物院典藏的珍貴文物，這些中華瑰寶立即引起全球矚目。

故宮博物院擇選文物赴英國展示，是項艱鉅大工程，亦是中外文化交流盛事。該場盛會導源於1934年4月，英國計劃隔年於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透過各項文物的展示，增進歐洲認識中國藝術與文化發展。隨後，英國政府請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1888-1952）協助聯繫國民政府，邀請中國共襄盛舉，並且徵求中華文物送往倫敦一同展示。國民政府、行政院經商議後，決定參加這場盛會，令教育部、外交部、內政部進行規劃，辦理各項事務。稍後，教育部長王世杰（1891-1981）主持並成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大小事宜。當故宮文物將赴英國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消息曝光後，國內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出現正、反面聲音，雙方意見交雜，支持者以國民政府參與此項國際性活動，正好可宣揚中華文化，應該極力促成。反對者則認為故宮典藏珍貴歷史文物，向來不運往國外展覽，強調前往英國必須經過長途跋涉，倘若文物遭遇不測有所損害，不僅無法挽救，甚至難以求償。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有人刻意製造謠言，宣稱國民政府表面示意將文物送至英國展覽，實際圖謀將國寶轉賣他國，賺取暴利，將使中華瑰寶一去不復返。「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為昭公信力排眾議，公布重要原則，並依該原則在1935年4月於上海舉辦為期5周文物預展，讓中國大眾先睹即將運往英國展示的文物。6月間，這些文物裝載至英國軍艦後，隨即運往倫敦。抵達英國後再經搬運，至展館建置、展品布置作業完成，即於11月28日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開幕典禮當日，正式對外展示。倫敦展示故宮文物經英國報刊報導，吸引歐洲參觀人潮，掀起一股中華文化熱潮。1936年3月7日，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落幕，故宮文物轉由英國郵輪運送，在英國軍艦護送下，在5月17日順利返抵上海。6月1日至21日，這批赴英國

展示的故宮文物回國後再經過整理，安排在南京對中國民眾公開展示，見證所有文物完好無缺。（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撰，1995；吳淑瑛，2004）。至 8 月，南京朝天宮文物保存庫房落成，故宮博物院遂將暫存上海與赴英國展示文物，移往朝天宮存放（那志良，1993）。

英國在倫敦開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係故宮博物院將典藏的文物首次運往海外展示，吸引大批觀覽人潮，也引起各國注意。在此之後，許多國家爭取故宮文物前往展示。例如在 1935 年 9 月，美國為慶賀 1789 年首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紐約宣誓就任將屆 150 周年，計劃在 1939 年至 1940 年舉辦「紐約世界博覽會（New York World's Fair）」，號召全世界共襄盛舉。美國邀請中國派代表參加，準備展品、商品前往展示、兜售，受到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影響，更希望徵求故宮博物院等機關提供文物展示。對此，國民政府衡量拓展中美友好關係、穩固雙方邦誼，決議參加紐約世界博覽會。接續，教育部成立「紐約世界博覽會籌備委員會」，負責安排會議，討論選送故宮博物院、北平古物陳列所等文物赴美展示作業（註 2）。惟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對華展開攻勢。8 月 13 日，上海遭到日本軍機轟炸後，鄰近的南京形勢危急，故宮博物院為避免朝天宮典藏的文物遭受戰火祝融，以及考量分散風險性，決定分三路將文物送往大後方。西遷文物暫時存放貴州安順華嚴洞、樂山安谷鄉大祠堂以及成都峨眉。之後，國民政府鑒於中日戰況激烈，必須集中全力抵禦日軍，加上故宮博物院忙碌文物西徙後方等安置作業，遂放棄參與紐約世界博覽會，停止文物輸運事務（陳世局，2014）。

隨著日軍在中國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戰爭情勢愈來愈緊急。對於故宮博物院西遷文物，如何躲避戰禍以保存璀璨中華文化，也成為國民政

府重要工作。令人驚訝的是，在這段烽火歲月裡，1939 年故宮博物院百件珍貴文物、中央研究院典藏古文物，以及各省提供文物與現代繪畫等計 1,900 件，先後運往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公開展示。1940 年 1 月，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開辦中國藝術展覽會，中國出示的文物與展品受各界好評，吸引各方人潮前往參觀而一再延期。1941 年初，國民政府再應允蘇聯邀請，將文物、繪畫再運往列寧格勒（聖彼得堡）賡續展示，增進蘇聯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不久後，德國舉兵大舉進攻蘇聯，列寧格勒深陷戰火之中。國民政府為顧及中華文物安全，要求蘇聯儘快運送回國，卻受困於遍地烽火而難以啟運。直至 1942 年底，這批赴蘇聯展示文物，在雙方斡旋與縝密安排後，再歷經長途的跋涉，方得以排除萬難返抵中國後方（李文儒，2005；鄭欣淼，2009）。

究竟，國民政府為何決議將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文物，以及各地出示的展品送往莫斯科參與中國藝術展覽會？這些中華文物留滯蘇聯期間，如何躲避戰火襲擊，最終又得以順利從列寧格勒安全啟運回國？1939 年，故宮博物院總務科科長勵乃驥（1897-1969）、科員傅振倫（1906-1999）二人負責將文物運往莫斯科，協助展品布置與古物鑑定事宜。根據傅振倫的紀錄，指出 1940 年 1 月 2 日中國藝術展覽會開幕後，中華文物吸引蘇聯民眾佇足參觀（傅振倫，1994），其與勵乃驥停留蘇聯協助辦理展覽事務，參觀蘇聯各博物館、圖書館、革命史蹟和名勝古蹟等地，最後兩人在 2 月 29 日搭乘火車離開莫斯科，踏上歸途（傅振倫，1997）。直至 1942 年，勵乃驥再奉故宮博物院的指令，前往蘇聯查點與接運文物返國。

透過傅振倫的紀錄，對於國民政府參與中國藝術展覽會，以及展覽會開幕情形能有約略了解。但是，兩人在 2 月底踏上歸途，未能再繼

續參與展覽會後續活動，亦未隨文物轉往列寧格勒。除了該項紀錄外，尚能透過其他記述，管窺中國赴蘇聯參展展覽會的情形。如胡淑敏根據《大眾報》記載，簡述國民政府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概況，提及蘇聯獲得國民政府援助，徵集眾多展品，擴大展覽會規模，遂延期至 1940 年 1 月開幕。蘇聯為宣傳這場展覽會，特別邀請美術家繪製五大幅不同的宣傳畫，其中有一幅畫以中國織錦圖案為底，左邊畫上松、竹、梅，右下角繪有戴著紅飄帶的大刀，寓意中國利用自身力量，保衛中華民族文化。展覽會開幕後，蘇聯各界前往參觀踴躍，有藝術家、歷史學家等觀賞者，也有大批工人與學生前往參觀，對於中國抗戰繪畫特感興趣。是年 6 月 26 日至 29 日，蘇聯特舉辦中國藝術史研討會，邀請藝術界專家、歷史學家、古物學家計兩百餘人，針對展覽會文物與中國藝術展開討論，並給予中國藝術品極高評價。（胡淑敏，1991）。至於這些文物運往列寧格勒，則隻字未提。對此，高佳敘述 1941 年 6 月德國進攻蘇聯，德蘇戰爭爆發，中國藝術品展覽會被迫中斷。中國各大報刊報載戰爭消息，同時促使國民政府加速聯繫蘇聯，希冀早日運回重要文物。該篇文章梳理外交部、駐蘇聯大使館、故宮博物院關切文物啟運回國，掌握各項消息，極力對蘇交涉，歷經多次商榷後決定運輸文物回國，之後再克服各項困難得以完成作業。只是，這篇文章並未註明引用的資料出處，必須再考證其內容的真實性（高佳，2014）。此即見證要研究當年國民政府參與在蘇聯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必須擁有充足的史料基礎，方能釐清各項事務之推展。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相繼開放檔案、史料。例如，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刊布〈有關北平故宮博物院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經過情形史料一批〉、〈中央研究院揀選文物運蘇參展相關函電〉，整理國民政府參與中國藝術展覽

會概況，尤其擇選故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部分文物赴蘇聯實況，有助釐清此段歷史事實（李寧，2007；劉鼎銘、胡嘯海、趙雲瀾，2007）。

臺灣方面，故宮博物院典藏抗戰期間故宮文物南遷、西移，以及抗戰結束後文物東歸等檔案，同時保存故宮文物多次赴海外展示的紀錄。宋兆霖長期關注故宮博物院選送文物赴外展覽議題（宋兆霖，1997；宋兆霖，2006；蔡玫芬，2006），亦運用故宮博物院檔案，勾勒國民政府與故宮博物院擇選文物赴蘇聯展示之情形（宋兆霖，2011）。在此基礎上，宋兆霖又運用前揭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刊布檔案，對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將中華文物送往蘇聯展覽、運返回國歷程，有精彩描述（宋兆霖，2013）。

在臺灣，因長期「反共抗俄」歷史教育架構，難以想像國民政府曾接受蘇聯的邀請，安排珍貴文物赴莫斯科展示。究竟，國民政府決定參與中國藝術展覽會之考量為何？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寧願冒著日軍攻擊風險，歷經千辛萬苦將文物運往蘇聯，其出發點為何？從展示概念觀察，國民政府是否藉中國藝術展覽會，趁機宣傳對日抗戰精神，以爭取國際認同？本文在前揭研究論述的基礎上，梳理與會人員紀錄、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刊布的檔案，國史館典藏《內政部檔案》，以及檔案局典藏《行政院會議紀錄》、《外交部檔案》、《故宮博物院檔案》（註 3），並輔以各類報刊資料，探究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參與中國藝術展覽會，致力將故宮博物院文物運往蘇聯展示，以及後續遭遇的各項挑戰。

貳、籌備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

1939 年初，蘇聯人民委員會藝術部籌劃將在首都莫斯科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希冀透過文物展示，讓參觀民眾瞭解中華文化發展，掌握

中國對日抗戰情形。經過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的聯繫，共有 11 個鄰近博物館願意提供典藏文物，有 1,500 餘件展品可提供展覽。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近代畫家與雕刻家作品，以及民間繪畫、標語，藝術手工製品，中國古代銅器、玉器、石刻文物，以及五代以降的繪畫。蘇聯設法向中國徵募展品，充實展覽內容。值此之際，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1891-1973）正在蘇聯商洽「中蘇通商條約」簽署事宜，並向蘇聯爭取貸款和軍事援助，強化對日抗戰力量（註 4）。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聯繫孫科，由於兼任中蘇文化協會理事長，為顧及中蘇文化交流以及爭取蘇聯對華提供援助，立刻請副理事長邵力子（1882-1967）代為徵集有關抗戰繪畫、標語。中蘇文化協會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分別於 4 月 1 日、25 日召開兩次座談會，邀請重慶市文化界知名人士約 40 餘人參加，商討徵集資料辦法，並聘請文化界名流 110 人為徵集委員，立即徵得 600 餘件展品將寄送至蘇聯。另外，蘭州、西安、天水、成都各地中蘇文化協會分會亦共襄盛舉，將寄出四箱展品；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也受邀將繪製的油畫、國畫 59 幅準備運往蘇聯（胡淑敏，1991）。

4 月 30 日，孫科聯繫行政院院長孔祥熙（1880-1967）向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徵募安陽出土殷商時代青銅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周秦漢銅器、陶器、玉器、骨器，漢魏唐宋雕刻及唐宋明清繪畫等展件，以彰顯國民政府之誠意。而依據蘇聯原本的計畫，這些展物必須在 7 月底前運抵莫斯科，按照蘇聯的規定，清楚標示可贈與對方的文物，或是展覽結束後必須歸還的物件。至於文物運往莫斯科的費用，則由蘇聯全部負擔（劉鼎銘等，2007）。

由於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文物珍貴，行政院遂召開會議討論。5 月 10 日，孔祥熙邀集內政部、教育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

等負責人員，針對赴蘇聯展覽事進行討論，並研擬文物赴蘇聯展覽計畫。對於此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長傅斯年（1896-1950）認為以兩個月來籌辦此事，實過於倉促，尤其中日戰爭期間，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文物已散藏各地，甚難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開箱、挑選作業。傅斯年提到這些文物珍貴，經過長途跋涉，必有震碎的疑慮，況且各省頻遭日機轟炸，地方警報聲四起，無論以陸路或海路運輸文物，都有極大的風險，要在指定時間內將各方文物送抵莫斯科，甚為困難。最後，傅斯年提到該所典藏的安陽出土殷商時代青銅器、骨甲刻片以及玉石雕刻等器物，大件者不易運輸，小件者多有殘缺，應該用照片展示較合適，並強調已與河南省政府訂定合作約定，不得隨意將這些古物贈送給第三者，此即意謂中國未能將這些古物餽贈蘇聯（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2011；宋兆霖，2013）。

6 月 1 日，行政院鑒於中國藝術展覽會展期接近，邀請相關部會人員討論。各部會鑒於籌備時間短、運輸危險性高，缺乏赴蘇聯參加展覽會的意願。行政院則基於中國抗戰之現實考量，欲透過文物交流穩固中蘇關係，以此開拓文化外交，因而請各部會預擬相關手續，羅列可能遭遇的困難，再交由行政院參考，以決議是否參加（陳克文，2012）。6 日，行政院召開第 417 次會議，討論「教育部及故宮博物院會同中央研究院審查報告蒐藝運俄展覽會案」，當時蘇聯已將展覽會開幕時間延至 9 月，但擇選文物赴莫斯科展出，仍有諸多問題尚待克服。第一、提選及運送的時間：如前揭所述，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將古物分別存放各地山洞、鄉村，倘若要開箱擇選文物，預估前者需要 6 個星期，後者需要 1 個月時間，才能完成作業。第二、運送路線的安排：從昆明至海防，再轉往海參崴，經西伯利亞鐵路至莫斯科，前後需要 2 個月；若從昆明至海防，

再轉香港至星埠，或由昆明經陸路至仰光，再西運前往莫斯科，更需要 3 個月。易言之，文物提選和運輸所需的時間，總計至少得 3 至 4 個月，很難在開幕前將文物運抵莫斯科。從實際情況考量，日本已控制中國東南半壁，若選用海上運輸方式，從海防轉香港至星埠，應按照中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之先例，請蘇聯派遣軍艦護送以策安全。至於物件的提選，中央研究院保管的安陽出土殷商青銅器、骨甲刻片，以及玉石雕刻等，大件古物不易運輸、裝箱費時，小件則多殘缺、易碎裂，每運一次必須重新粘接，應以照片展示為宜。至於蘇聯要求提供周秦漢銅器、陶器、玉器、漢魏唐宋雕刻，以及唐宋明清繪畫等，故宮博物院僅有銅器、玉器與繪畫，其他部分付之闕如。值得注意的是，押送文物人選至少派主持者 1 人、助手 2 人，必須精通古物管理，以及通曉俄文或其他外國語文，以辦理保管、陳列文物和宣傳中華文物事宜（註 5）。

由此可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欲將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珍貴文物運往莫斯科，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但無論從物件挑選、運送路線安排，或人員選派工作等，都充滿著挑戰。行政院第 417 次會議匯集各方意見後，儘管反對聲浪四起，並未放棄該項作業，仍力排萬難準備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行政院汲取各項意見之後，令各機關斟酌實際狀況，挑選適宜展物，並且規定這些文物不得轉贈蘇聯，另考量中華文物至為珍貴，為避免海上運輸突然遭到日軍襲擊的危險性，決定統一採用陸路運輸的方式，將文物輾轉輸往莫斯科（李寧，2007）。令人好奇的是，行政院為何甘冒文物可能遭受戰爭破壞、戰火祝融的風險，也堅持要將中華文物送往莫斯科展覽，其目的為何？

行政院決定參與中國藝術展覽會，與孫科極力爭取最有關係。1929 年，國民政府因中東路

事件，宣布和蘇聯斷交。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武力進逼東北，國民政府於翌年底與蘇聯恢復邦交活動，希望聯合蘇聯共同抵禦日本。然而，國共關係不睦，國民政府遲未與蘇聯啟動密切的合作關係。1935 年 10 月 25 日，中蘇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孫科擔任理事長，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Alexandre Bogomolov）為副理事長，而此半官方機構計劃舉辦文藝活動，透過文化交流以穩固中蘇情誼（高華，2012）。1936 年 11 月，國際情勢丕變，德國和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隨即撤離在華德籍軍事顧問，不再對華供應軍火物資，使國民政府頓失軍事協助。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爆發，英國、美國採取觀望態度，中國陷入孤立無援窘境。國民政府極力爭取外界協助，對抗日本軍事攻擊，也成為當務之急。值此之際，孫科立刻向蘇聯提出各類需求，雖然未能如願訂立中蘇軍事同盟以共同對抗日本，但仍促成雙方在 1937 年 8 月 21 日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中蘇合作基礎（高華，2012；陳立夫，1994）。於此之後，孫科接二連三出訪莫斯科，力爭蘇聯提供奧援。1939 年 4 月，孫科第三次訪問莫斯科，努力強化中蘇友誼關係，並爭取對方提供更多軍事、經濟援助，亦協助蘇聯向中國爭取重要文物赴中國藝術展覽會展示，以促成中蘇文化交流盛事。6 月中旬，在孫科奔走下，國民政府獲得蘇聯提供 1,500 萬美元貸款（賴澤涵、黃萍瑛，2013），宛如久旱甘霖，可挹注中國軍事和經濟發展。在此情勢下，孫科與孔祥熙等人不得不冒險將重要文物送往莫斯科展示，表面上是透過中華文物展覽強化中蘇文化交流，實際則是希望能夠藉由文化交流盛宴，增進中蘇友好關係，奠定兩者合作根基，以便於向蘇聯爭取更多資金協助中國，抵禦日軍在華軍事行動。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院決議冒險輸運文物赴莫斯科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除希望

能穩固中蘇友好關係，爭取蘇聯對華援助，抵禦日軍攻擊之外，其實藉著赴外展覽躲避戰禍，以確保文物安全。從 1938 年 2 月起，重慶與四川各地接連遭日本軍機空襲，遍地滿目瘡痍。6 月，故宮博物院為確保文物安全，擬具啟動開鑿山洞貯存文物計畫案，隨即呈請行政院裁示。行政院令內政部、教育部等評估、審查，與此同時鑒於戰亂頻起，建議故宮博物院與各單位可將重要文物暫時移往國外展覽，藉此管道躲避戰火破壞。由此觀察，行政院決議將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文物送往莫斯科，除了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透過中華文物對外展示，以穩固中蘇關係，亦希望透過在國外展覽，以確保文物的安全（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國民政府堅決參加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隨即各單位開始緊鑼密鼓籌劃各項作業。稍後，故宮博物院從隱藏在貴州安順縣華嚴洞的文物，擇選唐、宋、元、明、清繪畫及緙絲 50 件，古玉器物 40 件以及銅器 10 件等，先完成編目整理作業，再利用兩隻先前運往英國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裝置箱，重新髹漆後，用以裝載文物。8 月 12 日，交通部令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撥備卡車一輛，先從昆明裝載中央研究院展品兩箱，再前往安順接運故宮博物院兩箱展物，但車身載運量不足而衍生困難。後來，交通部緊急加撥一輛卡車隨行前往，避免文物過於擁擠而發生跌落損壞情形。這些文物經過甘肅新新峽，立即更換新疆省提供的專車，隨即奔往中蘇邊境。至於該次隨同貨物前往蘇聯的任務，依據行政院原本之指示，必須至少派遣主持人 1 人、助手 2 人，且這些人員必須熟悉中華文物典藏、歷史，並通曉俄文或其他國語言，以便屆時協助辦理文物保管、陳列與宣傳事宜。最後，中央研究院因故並未派員隨文物前往蘇聯，由故宮博物院舉派科長勵乃驥、科員傅振倫 2 人偕同文物運

輸事宜（註 6）。勵乃驥、傅振倫熟悉各類文物的保存，對各項文物歷史典故瞭若指掌，透過分工模式，分別負責行政、學術事務。值得一提的是，傅振倫曾經在 1935 年護送故宮博物院文物前往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富有文物在倫敦的國際展覽經驗，熟悉文物運送與布置事宜，是為最適合的人選。9 月 7 日，在勵乃驥、傅振倫的護送下，中華文物運抵蘭州，16 日抵達蘇聯邊境阿拉木圖，再轉換蘇聯提供的交通工具前往莫斯科，並於 24 日抵達目的地（傅振倫，1994）。

參、中國藝術展覽會的開辦

蘇聯人民委員會藝術部得知中國啟運文物赴莫斯科的消息，另提供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盧布 50 萬元，翻修展館與添加新式設備，以迎接中華瑰寶。國立東方博物館進行各項整修作業，也因此順延中國藝術展覽會開展期程。9 月底，蘇聯各地博物館與中華文物陸續運抵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展開文物整理作業，仔細考究每項文物歷史典故，添加註解說明，編制展品目錄，邀請專家講述中國歷史，以訓練展場解說人員。10 月 27 日，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舉行首次展品審查會，聚集蘇聯各方專家，從宋代書畫依序審理。原本，宋朝繪畫在蘇聯僅有蒐藏一幅，在國民政府的協助之下，屆時將同時展示 10 幅宋代繪畫，令人驚艷。緊接著，蘇聯專家審閱繡織品與各式龍袍、宮服，總計千餘件展品，每一件的繡工精巧，令專家對中國織繡藝術推崇不已（傅振倫，1994）。31 日，國立東方博物館審查銅器、瓷器與現代作品，添加註解。11 月 2 日，審查銅器、玉器與陶器，予以說明。12 月 16 日，再審查其餘文物。蘇聯爭取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提供百餘件文物，尚有中蘇文化協會從重慶徵集而來的照片、木刻兒童畫和各式宣傳畫等 600 餘

件，以及該協會在蘭州、西安、天水、成都等分會陸續寄送的四箱展品。另外，還有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提供 59 幅油畫。整體而言，中國歷代文物質量精美，樣式眾多，足以讓蘇聯與會參觀民眾大飽眼福（註 7）。

1942 年 1 月 2 日，中國藝術展覽會在蘇聯各界殷切期盼下，在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舉行開幕典禮，出席貴賓有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以及藝術委員會等機關首長暨蘇聯畫家，中國駐蘇聯大使楊杰（1889-1949）亦率領大使館人員出席開幕典禮。典禮上，藝術部副主席索洛多夫里科夫率先致詞，盛讚國民政府致力協助蘇聯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不辭辛勞提供質優精美文物，不僅充實展覽會各類展品內容，更提升其歷史文化價值。《真理報》報導中國藝術展覽會陳列的展品，除蘇聯各地博物館重要收藏外，國民政府特別提供雕刻、陶器、瓷器稀世珍品，見證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璀璨精美。另一方面，《真理報》專文報導中國藝術展覽會除了展覽中國歷代文物，亦展示許多現代繪畫作品，如實呈現中國對抗日軍侵略事蹟，形塑中國對日抗戰精神，吸引蘇聯民眾、學生駐足參觀（註 8）。整體而言，中國藝術展覽會展示高藝術性的中華文物，象徵中蘇友好關係，蘇聯民眾在藝術品的引領下，瞭解中華文明長遠發展，並同情中國抗日處境，關注中國民眾在烽火歲月下的生活狀況。

中國藝術展覽會開幕後，蘇聯各方報刊、媒體強力宣傳，吸引各地民眾前往參觀，每日進館人數都達到上限。在開幕半個月後，參觀人數即已突破 1 萬人（註 9）。之後，在中蘇文化協會聯繫下，再從中國運抵現代繪畫，有高劍父、何香凝、梁又銘、沈逸千、趙望雲等人作品（註 10）。這些新陳列品乃中國士兵、民眾英勇抗日的圖像，如梁又銘「機場的職責」，刻劃中國年輕航

空人員準備在瞬間襲擊敵人，「警報」乃描繪一位少婦緊握其子在警報聲逃逸的景象，充分顯現中國對日抗戰的緊張氛圍（註 11）。這些圖畫在蘇聯展示之效果，即達到宣揚中國對日抗戰精神的目的，喚起蘇聯各界的同情。由於展品數量龐大，各界對中華文物、抗戰情景有濃厚興趣，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徵得國民政府同意，將原本 2 個月展期再延長 6 個月，之後又應各單位請求，又繼續延長半年之久（註 12）。國民政府應允蘇聯的請求，不斷延長文物在蘇聯的展期，除了藉此穩固中蘇關係，其主要考量莫過於中國境內戰亂頻仍，若將這些文物運返國內，必有其危險性。易言之，延長文物在蘇聯的展期，一方面可向蘇聯表達善意，亦可由蘇聯負責文物安全。

當展覽會展期獲得延長時，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以經費僅能招待勵乃驥、傅振倫 2 個月，透過駐蘇聯大使館聯繫中蘇文化協會暫時召回 2 人，至展期結束時，再派遣 1 人前往莫斯科辦理文物點收與裝運作業（註 13）。對於此事，外交部呈請行政院決議。行政院權衡文物照料、經費開支等因素，採取折衷方式，鑒於傅振倫擁有參加國際展覽會的經驗，由他繼續留在莫斯科，至展期結束之際，直接負責文物接管與裝箱事宜，至於勵乃驥則先行返回中國。行政院長蔣中正（1887-1975）關切文物保護事宜，命令外交部向蘇聯查探是否能夠繼續招待傅振倫。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表示尊重國民政府意見，但無法負擔中國駐守人員開銷。最後，蔣中正考量蘇聯未能繼續提供招待條件，命令外交部轉飭 2 人一同回國（註 14）。2 月底，勵乃驥與傅振倫踏上歸途，返回中國（傅振倫，1994）。至於中國藝術展覽會事務，交由駐蘇聯大使館負責管理。

1940 年 12 月，中國藝術展覽會展期將屆，蘇聯各界仍希望能夠再延長展期。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聯繫駐蘇聯大使邵力子，請外交部協助向故

宮博物院表示已運用科學方法，讓展館溫度控制得宜，各種古畫、文物完好如初，強調蘇聯民眾對中國藝術與文物極感興趣，尤其 1941 年 2 月至 3 月間莫斯科各級學校將安排中國文化講題，展覽會陳列文物、藝術品正好可以提供參考，有助於學生的瞭解，希望能夠將展覽會延至 3 月底（註 15）。最後，國民政府答應蘇聯的請求，再延長展期，後來參觀的民眾超過 10 萬人，茲以見證中華文物風采與魅力（註 16）。

1941 年 2 月，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再派員與邵力子洽商，請其協助聯繫中蘇文化協會理事長孫科，並表示中國藝術展覽會在莫斯科展期超過 1 年，各項成績甚為美滿，參觀人潮依然絡繹不絕，擬請在展期結束之後，將文物轉往列寧格勒繼續展示，以滿足更多蘇聯對中國文化與藝術愛好者，能夠親睹中華文化風采。至於文物包裝與運輸等各項事務與費用，將由蘇聯擔負，並負責文物安全的維護（註 17）。在孫科的努力與奔走下，該項建議案經過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討論後，擬具意見並呈請行政院決議。3 月，蔣中正為滿足蘇聯各界的請求，決定將中國藝術展覽會的展覽文物，再至列寧格勒展示（註 18）。

有論者提及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通知駐蘇聯大使館，希冀中國各方提供莫斯科的展物，再運往列寧格勒愛爾米達什宮展覽之際，這些展品其實早已被運往列寧格勒（米鎮波，1996）。不管實情如何，蔣中正最終仍同意將展物送往列寧格勒，大抵欲透過文化交流，鞏固中蘇友好關係，賡續爭取蘇聯提供協助。與此同時，也透過中國提供的現代繪畫，讓蘇聯民眾瞭解中國抗戰艱辛，突顯日本在華暴行，喚起蘇聯與國際同情。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遭逢日本軍事攻擊，倘若將文物、藝術品啟運回國，勢必充滿荊棘，轉往列寧格勒展覽可由蘇聯擔負全責，在程度上相對安全。

列寧格勒是蘇聯工業發展重鎮，中國藝術展覽會移至該處，會場上總計 22 間展覽室，最吸引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文物和工藝品。蘇聯民眾參觀展覽會，得見中國最早象形文字與甲骨實物，以及各種字體碑帖，還有古代絲織品、木板雕刻神像，各式各樣雕刻與銅製器物，這些文物年代至少都在 2,000 年以上。展覽會的陳列品還有中國瓷器，從最原始的製品，到當時專門銷往歐美的特製品等，如實呈現中國瓷器完整的發展過程。其他展物還有脫胎漆器、景泰藍、素彩花瓶，以及水晶、玉石、象牙等各式擺飾，令參觀者欽羨中國文物藝術之精美，讚嘆工藝製造技術精巧（註 19）。列寧格勒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展期原本至 7 月底，受到德國侵略蘇聯影響，被迫提早結束。這些珍貴的中華文物，立刻引起中國各界的關切。

肆、德蘇戰亂中啟運國寶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國百萬大軍揮軍東歐，緊接著進攻蘇聯，揚起大規模戰事，迫使蘇聯進入戰爭狀態，情勢危急。列寧格勒位於蘇聯邊陲，鄰近波蘭，首當其衝遭到戰火波及。國民政府顧及文物安全性，立刻令外交部聯繫駐蘇聯大使館，請蘇聯在最短時間之內將展物運回中國，保障文物安全。倘若無法立即啟運，亦請蘇聯順應變局，採取適當方法，妥善保存文物。駐蘇聯大使邵力子與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洽商，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以中華文物珍貴，務必提供安全措施、具體因應辦法，協助將文物運返中國。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表示，蘇聯藝術委員會委員長赫拉姆欽科已親自前往列寧格勒辦理文物保護事宜，蘇聯人民委員會亦下令盡全力保護中國文物和蘇聯愛米達日（Hermitage）博物館的典藏品（註 20）。7 月 7 日，蘇聯外交部再向邵力子表示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在德國進攻蘇聯之際，已採取適當機制保護中國文物，並與愛米達日博物館珍貴典藏一同存放在安全處。儘管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蘇聯外交部相繼表示已按照最高規格保護文物，隨著戰爭情勢緊張，尚留在戰區的文物也愈來愈危險。外交部再與故宮博物院商議後，請邵力子建議蘇聯方面將文物先運至遠離戰爭的安全地點，接續再由駐蘇聯大使館派員協助文物運返回國事宜（註 21）。對此，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表示文物已運至列寧格勒以外的地方儲藏，並保證文物絕對安全，不受戰爭干擾（米鎮波，1996）。至於文物啟運返回中國，仍得從長計議，並視戰爭後續情形而定。

8 月初，德國圍攻列寧格勒，切斷其與周邊城市的鐵路運輸網絡，而中華文物早已送往其他城市典藏，否則若遭到戰火祝融，損失甚難估算。只是，蘇聯未明確指明文物典藏處所，加上戰爭仍未停歇，讓國民政府、行政院與各部會惶恐不安。8 月底，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以國人重視中華文物，強調 1936 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結束後，文物隨即運回國內而未准延期，堅持請蘇聯啟運文物啟運，派專機將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出示的珍貴文物運往蘭州，其餘近代繪畫與文物則可暫緩處理（註 22）。9 月底，蔣中正評估國內輿論與蘇聯情況後，認為蘇聯境內戰爭危急，再令駐蘇聯大使館照會蘇聯外交部，要求儘快派遣專機將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借展文物送回蘭州，轉交國民政府接運，強調中國急需這批文物，希望蘇聯盡力提供協助，完成文物啟運回國任務（米鎮波，1996）。

10 月中旬，在國民政府的堅持下，蘇聯縱使已深陷戰爭泥淖，仍按照蔣中正的要求，籌劃將文物運至蘭州，令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負責辦理該項事務。但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向國民政府表示，蘇聯飛機已佈署軍事作戰和物資接運，

欲透過飛機運輸文物至蘭州實無充分把握，同時說明文物暫時安全存放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請派員前往阿拉木圖，再轉搭火車前往查驗（註 23）。11 月 9 日，蔣中正衡量德蘇戰爭情勢、蘇聯交通疏運狀況，再參照〈飛運古物辦法〉，指示外交部、交通部、故宮博物院中華文物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至阿拉木圖毋須透過飛機運送，可透過鐵路輸運，但從阿拉木圖至蘭州只能利用飛機運輸，令故宮博物院派員前往接運，其他部會再適時予以協助（註 24）。對於蔣中正的安排，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理事長克米諾夫則指出蘇聯鐵路運輸繁忙，因應戰爭狀態，多已充作軍事運輸或協助輸運人員疏散，尤其列車必須沿途停靠，容易遭受攻擊，安全性仍有疑慮，可否稍緩運送以策安全。國民政府為顧及國內民眾觀感，未再順從蘇聯意見，強調儘快商議接運辦法，早日將文物運返回國，以避免輿論攻訐（註 25）。1942 年 1 月初始，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因應國民政府的要求，將文物裝箱、清點後，調撥專機運送文物（註 26）。蔣中正重視這批文物啟運回國，因此接連訓令外交部、交通部加派人力協助處理；與此同時，令故宮博物院負責接收專員勵乃驥辦理相關手續，籌劃文物接管實務（註 27）。1939 年，國民政府運往蘇聯的展品有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文物、照片，中央大學教授提供的繪畫，以及四川、陝西、甘肅等地提供的文物、展品。其中，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珍貴文物未能贈與蘇聯，但中央大學與四川、陝西、甘肅等展品並未說明應該運回國內或是贈送蘇聯，必須再請中蘇文化協會確認，開列清單交由勵乃驥前往查收（註 28）。

3 月 17 日，勵乃驥辦妥赴蘇聯的手續，完成各項前置作業，準備動身前往蘇聯查驗與接運文物。值此之際，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通知國民政府，以阿拉木圖機場因山雪融化已嚴重積水，飛

機甚難起降，必須延至 4 月中旬才能啟運文物，建議勵乃驥直接前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點收文物，毋須在阿拉木圖開箱檢驗後，再重新裝箱而浪費時間（註 29）。行政院整合各部會意見，堅持原議，請勵乃驥前往阿拉木圖點收文物，待完成是項作業後，立即運送文物回國。惟蘇聯籠罩在戰事陰霾下，缺乏班機接送運輸，文物啟運作業困難重重（宋兆霖，2013）。另一方面，從蘭州至重慶的飛機及其油料缺乏，亦延誤文物輸運時程，行政院緊急聯繫交通部調度安排（註 30）。直至 9 月 1 日，勵乃驥在阿拉木圖查驗文物，確定數量無誤，並裝箱搬上專機後，隨即從阿拉木圖起飛，中途經過哈密，5 日抵達蘭州短暫停歇後，又於 8 日從蘭州起飛直奔重慶。歷經德蘇戰火的威脅，以及路途重重阻礙和波折，這批前往蘇聯參加展覽會的文物終於返抵國內（註 31）。9 月 22 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偕同理事王世杰、張道藩、羅家倫等人，在該院辦事處開箱點驗文物，確認數量無誤，並且造冊備查（高佳，2014）。12 月 25 日，國民政府為展現這批文物完好無缺，仿效 1936 年中華文物在倫敦中國國際藝術展覽會閉幕返國後，曾在南京對外公開展示，即於重慶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向民眾展現曾赴莫斯科、列寧格勒展示的重要文物。至翌年初，全國美術展覽會閉幕後，相關文物則交由原典藏單位保管（註 32）。

伍、結論

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等機關重要文物南遷與西徙，乃是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期間捍衛中華文化之重要發展。中華文物播遷歷程，與國家興亡與民族精神緊密契合（鄭水森，2010）。值得注意的是，故宮博物院與相關機構曾在西南諸省辦理文物展覽活動，對中國後方文化事業發展有

正面的影響（註 33）。另一方面，1940 年至 1941 年間，千餘件中華文物遠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對外展示，讓蘇聯見識璀璨中華文化，亦將中國堅韌抗戰精神展露無遺。

從國民政府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的歷程，可見證其維繫中蘇友好關係、宣傳對日抗戰精神，以及保護文物安全的努力。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進軍東北，中蘇兩國漸摒棄成見，恢復外交關係，雖未能即刻共同抵制日本，亦不至於反目成仇。至德日聯合反共，以及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陷入孤立無援窘境，隨即開啟中蘇攜手合作之局。在此期間，蘇聯提供中國經濟援助，替代原先德國在華軍事專家，協助國民政府整頓軍事、強化軍備，抵制日本在中國擴張軍事勢力。1939 年，國民政府放棄參加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卻在最險峻的情勢下，堅決參與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排除萬難將文物運往蘇聯，穩固中蘇友好關係。縱使中蘇兩國對彼此各有所圖，但仍可見證這段期間乃民國時期中蘇最親善的時刻。

再者，觀察莫斯科、列寧格勒開辦中國藝術展覽會，中國提供展示文物，讓蘇聯民眾認知中華文化璀璨、歷史源遠流長，以及精湛的工藝製作技術。中國藝術展覽會是中蘇文化交流饗宴，同時也是國民政府文化外交的展現。再者，中國藝術展覽會展示文物、器物外，亦有許多現代繪畫，歷歷呈現中國社會抗戰實況，頗受蘇聯民眾盛讚。由此可見，透過博物館展示功能，這些象徵性的繪畫弘揚中國抗戰精神，宣揚中國抗戰理念，並喚起蘇聯對華情感，給予實質援助，以力抗日本軍事侵奪。

最後，從國民政府將文物送往蘇聯展示的歷程，可窺探其對文化保存不遺餘力。如前所述，1932 年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1937 年故宮博物

院文物西徙，已見證國民政府及相關機構遭逢戰亂之際，保護文物的努力。1939年，中國境內遭日軍轟炸、戰禍頻仍，國民政府冒險將文物送往蘇聯展覽，實考量國外安全環境可確保文物安全。除此之外，國民政府先後答應蘇聯請求，延長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展期，在會期結束後，再讓文物轉往列寧格勒展示，亦有保護文物的思

維。直至1941年6月，德蘇戰爭爆發，國民政府關切文物安全，聯繫蘇聯啟運文物回國。這批文物歷經波折，終於在1942年底返抵四川，並在重慶全國美術展覽會對外展示，見證赴蘇聯展覽的各項文物完好無缺，亦以此突顯國民政府保護文物的努力。

參考文獻

1.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2011）。《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2. 吳淑瑛（2004）。博物館展覽與國族、文化的想像——以中國倫敦藝術國際展覽會（1935-1936）為例的觀察。《近代中國》，157，44-70。
3. 李文儒主編（2005）。《故宮博物院80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4. 李寧選輯（2007）。有關北平故宮博物院參加蘇聯藝術展覽會經過情形史料一組。《民國檔案》，2007（4），16-28、32。
5. 宋兆霖（1997）。「中華瑰寶」在美國展出之周延曲折與充實光輝。《故宮文物》，171，92-99。
6. 宋兆霖（2006）。略記故宮八十年來的重要海外活動。《故宮文物》，277，108-127。
7. 宋兆霖（2011）。路漫漫其修遠兮——記抗戰時期故宮參加之蘇聯「中國藝術展覽會」及其文物歸還。《故宮文物》，341，58-67。
8. 宋兆霖（2013）。歷史的能見度：再探抗戰時期中國文物赴蘇聯展覽之千迴百折。《紫禁城》，2013（03），14-33。
9. 高佳（2014）。中國赴蘇聯展覽藝術品歸國記。《紅巖春秋》，2014（8），42-44。
10. 高華（2012）。《多變的孫科——歷史學家高華筆下的孫中山之子》。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11. 那志良（1993）。《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臺北：那志良。
1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撰（1995）。《故宮七十年星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3. 胡淑敏（1991）。1940年“中國藝術展覽會在蘇聯紀實”。《中國博物館》，1991（2），93-94。
14. 傅振倫（1994）。《傅振倫文選類存》。北京：學苑出版社。
15. 傅振倫（1997）。《蒲梢滄桑·九十憶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6. 劉鼎銘、胡嘯海、趙雲瀾選輯（2007）。中央研究院揀選文物運蘇參展相關函電。《民國檔案》，2007（4），3-15。
17. 陳立夫（1994）。《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
18. 陳克文（2012）。《陳克文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 陳世局（2014）。國史館館藏國民政府時期故宮海外展覽史料介紹。《國史研究通訊》，7，175-181。
20. 賴澤涵、黃萍瑛（2013）。《立法院長孫科傳記》。臺中：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21. 蔡玫芬主編（2006）。《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2. 鄭欣淼（2009）。《故宮與故宮學》。臺北：遠流出版社。
23. 鄭水淼（2010）。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9（5），1-13。

註釋

- 註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 行政服務 / 新聞專區網頁，神品至寶展，參觀總人數達 65 萬人次（2016 年 3 月 1 日）。檢自 <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5990>。
- 註 2. 內政部檔案（1938 年 7 月 20 日）。籌辦參加紐約世界博覽會及藝術展覽，參加紐約世界博覽會及藝術展覽。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259A。
- 註 3. 內政部檔案。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提選文物運蘇展覽暨籌辦經過情形。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197A。
- 內政部檔案。故宮博物院函以駐蘇聯邵大使電陳留蘇古物現與蘇聯國寶同存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207A。
- 內政部檔案。北平故宮博物院留蘇文物在列寧格勒繼續展覽。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208A。
- 註 4. 莫斯科通訊（1940）。「中國藝展」在蘇聯。《文藝新聞》，9-10，8。
- 註 5.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1939 年 6 月 6 日）。行政院第四一七次會議：藝術品運俄展覽，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紀錄案（第 416 至 420 次）。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0000000A /0028/2-5-1/154。
- 註 6. 內政部檔案（1939 年 8 月 4 日）。內政部古物保管委員會收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公函：為提選文物運蘇展覽暨籌辦經過情形函請查照，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提選文物運蘇展覽暨籌辦經過情形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197A。
- 註 7. 參見莫斯科通訊（1940）。「中國藝展」在蘇聯。《文藝新聞》，9-10，8-9。
- 註 8. 參見陳石孚（1940）。中國藝展在蘇聯。《時事月報》，22（2），90-92。
- 註 9. 摘自塔斯社莫斯科航訊（1940）。中國藝展在蘇聯之盛況。《中蘇文化雜誌》，6（2），56。
- 註 10. 長林（1941）。中蘇史論：評莫斯科中國藝展的成就（VOKS 特稿）。《中蘇文化雜誌》，9，124。
-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1 月 12 日）。外交部收莫斯科邵大使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 /0029/150.7/0001。
- 註 11. 支（1941）。中國藝展新陳列品運抵蘇聯（譯自蘇聯國際文學）。《建軍畫報》，5，12。
- 註 12. 國際消息（1941）。中國藝展在蘇聯。《廣西教育通訊》，3（3-4），46。
- 註 13. 外交部檔案（1940 年 1 月 17 日）。外交部致中蘇文化協會公函：請召回中國藝術展覽會赴莫職員事，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 /0029/150.7/0001。
- 註 14. 外交部檔案（1940 年 1 月 31 日）。外交部致北平故宮博物院函：關於將中國藝展會留莫職員暫召回國事，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 /0029/150.7/0001。
- 外交部檔案（1940 年 2 月 19 日）。外交部收行政院指令：電駐蘇大使館飭知，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 /0029/150.7/0001。
- 註 15. 外交部檔案（1940 年 12 月 16 日）。外交部收莫斯科邵力子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 /0029/150.7/0001。
- 註 16. 記者（1941 年 1 月 6 日）。莫斯科中國藝展，參觀者盡十萬人。《中央日報（重慶）》，3 版。
- 註 17. 記者（1941 年 2 月 11 日）。蘇聯人士復慕我文化，莫斯科中國藝展，移列寧格勒舉行。《中央日報（重慶）》，6 版。
- 註 18. 內政部檔案（1941 年 3 月 5 日）。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呈為留蘇文物應否准在列寧格勒繼續展覽，北平故宮博物院留蘇文物在列寧格勒繼續展覽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208A。
- 註 19. 文化情報（1941）。蘇聯的中國藝展。《華南公論》，1，156。
- 註 20.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7 月 2 日）。外交部收莫斯科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 /0029/150.7/0001。

- 註 21.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7 月 11 日)。外交部致邵大使電稿，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記者(1941 年 7 月 19 日)。我國運蘇藝展物品，業已移存安全地帶。*中央日報(重慶)*，3 版。
- 註 22. 內政部檔案(1941 年 9 月 2 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箋函，故宮博物院函以駐蘇聯邵大使電陳留蘇古物現與蘇聯國寶同存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史館，入藏登錄號：026000015207A。
-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9 月 27 日)。外交部收行政院訓令，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3.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10 月 13 日)。外交部收莫斯科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4.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11 月 9 日)。外交部收行政院訓令，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5.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11 月 14 日)。外交部收古比雪夫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外交部檔案(1941 年 12 月 30 日)。外交部致駐蘇聯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6. 外交部檔案(1942 年 1 月 7 日)。外交部收古比雪夫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7. 外交部檔案(1942 年 1 月 17 日)。外交部收行政院指令，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外交部檔案(1942 年 1 月 26 日)。外交部收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函：函請示知貴部擬派協運古物人員事，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8. 外交部檔案(1942 年 2 月 12 日)。外交部收古比雪夫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外交部檔案(1942 年 2 月 14 日)。外交部致中蘇文化協會司函：關於留蘇展品事，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29. 外交部檔案(1942 年 4 月 1 日)。外交部收古比雪夫大使館電，留蘇古物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29/150.7/0001。
- 註 30. 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1942 年 7 月 25 日)。我國在蘇展覽之古物決定由故宮博物院派員前往裝運回國等由，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及其它專題展覽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35000000E/0031/200/001/001。
- 註 31.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1942 年 9 月 22 日)。行政院第五八二次會議：留蘇展覽古物運返重慶案，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紀錄。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0000000A/0031/2-5-1/187。
- 記者(1942 年 9 月 9 日)。在蘇展覽之古物重返重慶。*中央日報(重慶)*，2 版。
- 註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1942 年 12 月 12 日)。奉令選送古物交美展會以遵辦特呈備案由，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及其它專題展覽。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35000000E/0031/200/001/001。
- 註 33. 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1943 年 6 月 14 日)。函為商借古物一部運渝展覽希查照由，專題展覽展品選借及運輸事宜案。檔案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35000000E/0032/500/003。